

# 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渊源考略

李 菁, 陈心蓉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摘要]**《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项宏伟大业,其对于保存文献典籍,传承传统文化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四库学”的区域研究上,嘉兴板块具有重要价值。嘉兴学者不仅大量参与了“四库”的征献、编纂、校核等工作,并在民国时期抢修文澜阁《四库全书》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嘉兴学者之著述更大大丰富了这一宏伟文献。以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关系为视角,可将嘉兴学者与《四库全书》的重要渊源凸显出来。

**[关键词]**嘉兴学者;《四库全书》;渊源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4)05-0106-05

## Brief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Jiaxing Scholars and *The Si Ku Quan Shu*

LI Jing, CHEN Xin-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Zhejiang 314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 Ku Quan Shu* (i. e.,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is a great work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with immeasurable valu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gigantic work, Jiaxing sector had the important value. Jiaxing scholars were not only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work of collecting, compilation, proof reading etc., but also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engaged in rescuing and repairing *The Si Ku Quan Shu* in the Wenlan Tower with indelible contribution. What's more, the works of Jiaxing scholars in the book greatly enriched the grand work of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Jiaxing scholars and *The Si Ku Quan Shu* will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origin of the book from the Jiaxing scholars.

**Key words:** Jiaxing scholars; *Sikuquanshu*; contribution.

乾隆中期,社会太平,经济发达,文化兴隆。为进一步促进学术的发展,也为保存中国历代之典籍,在乾隆的号召组织下,自 1772 年始,历 10 年,编成《四库全书》这一大型文献丛书,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学术精神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四库全书》的征书、献书及编纂、校勘过程中,嘉兴籍学者与《四库全书》关系十分密切,成为《四库全书》纂修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末,南三阁劫后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与

嘉兴藏书家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文宗、文汇两阁皆毁于火。后太平军两度攻占杭州,文澜阁亦遭兵火,所幸劫后尚有遗存。经过“丁丙补抄”、“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文澜阁库书终获复全,三次补抄无不浸透嘉兴藏书家和相关人士的心血。

纵览这一大型文献丛书,收录有汉唐至清代百余种嘉兴学者著述,充分体现了嘉兴学者对《四库全书》在文献上的重要贡献。因此,在整个《四库全书》

收稿日期:2014-06-28

基金项目: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浙江进士藏书研究”成果之一(11YJA870004)

作者简介:李 菁(1979-),女,江西赣州人,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陈心蓉(1959-),女,江苏连云港人,嘉兴学院图书馆研究员,主要从事嘉兴地方文献的整理与开发。

的编纂存留史上,嘉兴籍学者相随始终,他们珍藏典籍、著书护书、传承文化的精神光耀史册,他们与《四库全书》之间有挥之不去的文渊情结。

### 一、清四库馆臣中的嘉兴学者及著述分布

《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正式开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规模的修书机构,四库馆集中了大批管理及办事人员,形成一个庞大的纂修机构。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四库馆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开馆十年间,历任馆员达360人之多,其入选者多为进士出身、学有专长、名重一时的文人学者<sup>[1]</sup>。

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全书总目》等文献资料考查,嘉兴籍官员和学人进入四库全书馆者为数甚多,他们担任了副总裁及以下许多职位。其中副总裁10人,嘉兴钱汝诚、平湖沈初入选;总阅官15人,嘉善谢墉入选;总校官一人,由桐乡陆费墀担任;另有翰林院提调官22人,海宁人祝德麟、桐乡冯应榴入选;武英殿提调官九人,桐乡陆费墀、海宁人查莹担任;总目协勘官七人,秀水汪如藻担任。另有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39人,石门陈万青任职其中;缮书处分校官179人,桐乡冯集梧入列。在上述文献资料中,还有一些曾经在四库馆供职的人员未见题名。如钱载于四十四年被任命为总阅,在四库馆臣中也占有重要位置<sup>[2](P107)</sup>。

综上,我们可以统计出嘉兴人参与《四库全书》的馆臣多达11人,其中副总裁2人,总阅官2人,总校官1人,翰林院提调官2人,武英殿提调官2人,总目协勘官1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1人,缮书处分校官1人,其中陆费墀为身兼两职。

由此可见,在四库全书馆任职的嘉兴学者不仅人数众多,且身居要职,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实际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四库全书馆中地位重要、文采斐然、人品俱优的群体(见表1)。

在参编《四库全书荟要》时,嘉兴学者也多有参与。根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十二月荟要处开列的任事诸臣衔名,总校兼编纂官仅一人,由陆费墀担任,提调官2人,其中查莹位列其中<sup>[2](P286)</sup>。而这两人都是身居要职的重臣。

表1 嘉兴学者在四库馆中的任职情况

| 官职           | 姓名  | 籍贯 | 备注          |
|--------------|-----|----|-------------|
| 副总裁          | 钱汝诚 | 嘉兴 |             |
|              | 沈初  | 平湖 |             |
| 总阅官          | 谢墉  | 嘉善 |             |
|              | 钱载  | 秀水 |             |
| 总校官          | 陆费墀 | 桐乡 | 兼任《四库荟要》总校  |
| 翰林院提调官       | 祝德麟 | 海宁 |             |
|              | 冯应榴 | 桐乡 |             |
| 武英殿提调官       | 陆费墀 | 桐乡 |             |
|              | 查莹  | 海宁 | 兼任《四库荟要》提调官 |
| 总目协勘官        | 汪如藻 | 桐乡 |             |
| 校勘《永乐大典》兼分校官 | 陈万青 | 桐乡 |             |
| 缮书处分校官       | 冯集梧 | 桐乡 |             |

明清两代,嘉兴教育事业及私人藏书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嘉兴士子参与科举及醉心与藏书刻书的人也大大增加。这一时期,涌现了如项元汴、李日华、周履靖、沈德符、曹溶、朱彝尊、查慎行等一批在地方乃至全国均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坛大家。他们的著述极大地充实了《四库》。

《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存目有6819种,堪称卷帙浩繁。据浙江学者毛春翔《四库著录浙江先遗书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浙江人著作共805种,入存目者1618种,著录种数占《四库全书》的四分之一略弱,卷数占五分之一略强。笔者据《四库总目》及《嘉兴市志》的统计,在《四库全书》中,收录嘉兴学者著作88种,入存目者407种,共计495种、6643卷(另27种无卷数)。著述数量位于浙江学者的前列<sup>[3]</sup>(见表2、表3)。嘉兴是清康乾间文字狱的重灾区,此处所述尚未包括被禁毁之书。

其收录的作者中,不乏汉唐至清各朝的文学重臣,如陆机、吴镇、项氏家族、李日华、沈德符、曹溶、朱彝尊等大家。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算术、方志、文学、艺术、医学、经学等各个门类。《总目》将所著录的书籍分4部、44类。嘉兴人著述中经部84种、史部109种、子部149种、集部153种,除了楚辞、释家、时令、载记、纪事本末5类没有著作被《总目》著录,其余39类则都具备。以上可见,嘉兴学者涉猎面极其广泛,研究成果丰硕。曹溶、朱彝尊、查慎行

等人的著作更成为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嘉兴学者著作的广泛收入对于传播地域文化,贡献各家学术经典,保存方志典籍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不少士子为了获取这些珍本秘籍,不惜日夜手抄,孜孜不倦。读书、藏书成为盛行一时的风气。嘉兴学者著作的广泛收录也体现出嘉兴人文重镇的地位。

表 2 《总目》中嘉兴学者及著述成果分布

| 类别 | 朝代 |   |     |   |    |   |     |     | 合计  |
|----|----|---|-----|---|----|---|-----|-----|-----|
|    | 汉  | 晋 | 南北朝 | 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
| 文人 | 1  | 2 | 1   | 2 | 18 | 5 | 160 | 121 | 310 |
| 著述 | 1  | 2 | 1   | 2 | 29 | 5 | 255 | 204 | 499 |

表 3 《总目》中收录的历代嘉兴寓贤著述

| 类别 | 朝代 |   |   | 合计 |
|----|----|---|---|----|
|    | 宋  | 明 | 清 |    |
| 文人 | 4  | 3 | 1 | 8  |
| 著述 | 9  | 2 | 4 | 15 |

## 二、嘉兴学者参与编纂《四库全书》

### (一)积极献书,充实《四库》

明清以降,江南藏书之风甚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他们的藏书量多品精,且不乏珍本秘籍,成为征书的重要对象。其时,浙江冠为“书肆最多之区”<sup>[4](P17)</sup>,嘉兴尤为突出。从明清以来,嘉兴就出现了项氏天籁阁、朱彝尊曝书亭、鲍廷博知不足斋、吴騫拜经楼等大批藏书名家名楼。宏富的藏书为《四库全书》的征用提供了有力来源。

《四库全书》原著来源有六:一为清廷自藏自刊本,计 748 种;二为清廷自编书,计有 149 种;三为《永乐大典》辑佚书,计 516 种;四为通行书,计 187 种;五为各省地方官采进书,计 7871 种;六为各藏书家进呈书,计 5028 种<sup>[1]</sup>。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所据原著 89.0%来自各省采进本与各藏书家进呈本。

浙江籍学者进呈藏书的数量名列前茅,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曾据涵秋阁钞本统计了浙江壬辰冬到甲午夏两年半间浙江籍学者进呈藏书状况,“自壬辰冬(1772 年)至甲午夏,凡奏书十二次,为种 4523,为卷 56955,不分卷者 2912 册,可谓盛矣。”<sup>[5]</sup>此两

年半间,嘉兴学者进呈数量达到 978 种(此数据仅为私人献书),在浙本中占到 21.6%。

在《四库全书》整个纂修过程中,嘉兴学者鲍廷博父子、朱彝尊、汪如藻、陆费墀、祝德麟、查莹均为积极献书并青史有名者。为纂修《四库全书》所征集的大量图书中,私人进书至 500 种以上者,为浙江鲍士恭(鲍廷博之子)、范懋柱、汪启淑,江苏马裕四家。其中嘉兴桐乡鲍氏由于献书之多,书类之精良,而被称为“天下献书之冠”。《四库全书》成,共收录鲍氏家藏书 378 种、3581 卷,存目 125 种<sup>[6]</sup>。

嘉兴学者朱彝尊是清初著名藏书家,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时,颁上谕点名索取曝书亭朱氏遗藏。浙江巡抚三宝于三十八年(1773)闰三月二十六日奏报:“曝书亭久经坍塌,书亦散佚无存,但为时较近,尚易踪迹。其族孙现任嵊县训导朱休度,曾经觅送过三十二种,内选取一十二种。”<sup>[4](P89)</sup>据《四库全书总目》载,著录朱氏曝书亭藏书 33 种、380 卷。

此外,四库馆臣也多有献书。汪如藻献书 271 种,最后《四库全书总目》收录 151 种;陆费墀献书若干种,《总目》收录 9 种;祝德麟献书 2 种,《总目》收录 2 种;查莹献书 1 种,《总目》收录 1 种(见表 4)。

表 4 嘉兴学者私人献书情况

| 姓名       | 进书种数 | 《四库总目》<br>收录数 | 四库存目<br>收录数 |
|----------|------|---------------|-------------|
| 鲍士恭      | 626  | 382           | 131         |
| 曝书亭(朱彝尊) | 69   | 33            | 28          |
| 汪如藻      | 271  | 152           | 55          |
| 陆费墀      | 若干   | 9             | 2           |
| 祝德麟      | 2    | \             | 2           |
| 查莹       | 1    | \             | 1           |

### (二)稽古右文,参编《四库》

嘉兴学者不仅积极参与征书献书,还有不少人在编纂中担任要职。他们主要负责书籍的遴选、编排、缮录及校勘工作,其中陆费墀用力尤多。

陆费墀,嘉兴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四库馆开,他身兼总校官及武英殿提调官两职,主要承办《四库全书》并《荟要》处缮录之事。由于办事勤勉,且学问亦优,很快升任侍读,擢少詹事。四十七年(1782)兼任《四库全书》

历代职官表总纂官。四十八年(1783),赴奉天负责《四库全书》入贮文溯阁。四十九年(1784)兼任《四库全书》馆副總裁官,经管江浙三阁《四库全书》的续缮工作。五十二年(1787)因乾隆抽查《四库全书》中应毁未毁及校对讹误而革职留任,赔办江浙三阁三份《四库全书》的全部制匣费用。后又因底本未移交明白而落职。次年,寓居西湖校文澜阁已到之书。又因查出“内廷四阁”所贮《四库全书》装函排架舛错,赔缴经费银一万两。几经打击,忧愤交加,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抑郁以终。

陆费墀在馆时间长达二十年,在办理库书的过程中,综核稽查,实心勤勉。其在四库馆“先后十有七年,辰入酉出,寒暑未尝稍懈。氏在馆久,目无未见之书,每披阅有会心,手钞节录,若急饥渴。”<sup>[7]</sup>实为四库馆中一大功臣。尤其在辨误方面,他非常有自己的心得,并亲自对书中易错字进行了校正,写有《四库全书辨正通俗文字》一书,共辨正误字20个,避免了以讹传讹。

祝德麟在《四库全书》江浙三阁全书的复校工作上贡献甚多。为《四库全书》的续缮一事,有不少校官拖沓推诿,草率敷衍。为保证进度,祝德麟专门奏请准许各校员照从前分校之例,且可将书携带回宅,有家中静心从容校对,而对书籍弄脏或遗失者,照数赔偿。赏罚分明的办法不仅加快了复校的进度,更使校对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嘉兴学者朱彝尊对《四库全书》的编订体例也有较大贡献。乾隆皇帝在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时,对朱彝尊的著作表现得尤为关心。他在审阅四库馆进朱彝尊《经义考》之后,认为此书“于历代说经诸书广收博考,存佚可征,实有裨于经学”,因此,“亲制诗篇,题识卷首。”<sup>[4](P583)</sup>

### 三、民国时期抢修《四库全书》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告成,因垂念江浙多好古之士,特在杭州孤山圣因寺动工修建文澜阁贮存其书,并于次年秋完工。

给文澜阁颁发藏书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嘉庆初年结束,共颁发给文澜阁“书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册,为匣六千一百九十”<sup>[8]</sup>。文澜阁藏书开始由

浙江盐运使掌管,设有监理、编校、典守、司事等职,承担这些工作的要人中就有嘉兴著名学者陆费墀。

此外,南三阁劫后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嘉兴藏书家和相关人士更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文宗、文汇两阁均遭焚毁,文澜阁亦亡失几尽,所幸劫后尚有遗存。嘉兴学者参与“丁丙补抄”、“乙卯补抄”和“癸亥补抄”,使文澜阁库书终获复全。“丁丙补抄”中,嘉兴海宁蒋氏提供了《别下斋丛书》、《涉闻旧梓》等丛书;嘉兴藏书家单丕曾参与钱恂主持之文澜阁《四库全书》“乙卯补抄”,民国16年(1927)5月至次年8月任浙江图书馆国文部主任,管理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善本书。

而在“癸亥补抄”中,嘉兴学者张宗祥功绩卓著。张宗祥,字闾声,号冷僧,海宁硖石人,少有闻名,才华过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人。民国12年(1923)张宗祥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鉴于“乙卯补抄”尚有未竟之业,张宗祥倡议补抄文澜阁阙书阙卷,以使库书复原。张氏的建议得到了好友张元济、单丕等著名人士的响应与支持,在多方帮助下,张宗祥组织人力在北京举行第三次补抄,史称“癸亥补抄”。此次补抄历时两年多,共补抄阙书211种4497卷2046册,校正丁抄四库213种5660卷2251册,重抄577页,使文澜阁《四库全书》更趋完善。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宗祥曾任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委员,在抗战中安全转移并将《四库全书》运回杭州,保存了这套珍贵的史料。

文澜阁《四库全书》是“南三阁”的唯一幸存者。经过多次补抄,这部《四库全书》具有独特价值,很大一部分内容远高于原写本。首先,文澜四库所收之书大多为孤本或未曾刊行者,外间无由购得,具有珍本的价值;其次,补抄时依据的许多版本属于未经抽、删、改的精善本。

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从“丁丙补抄”海宁蒋氏别下斋提供善本,到“乙卯补抄”单丕参与主持,至张宗祥主持“癸亥补抄”及张元济的鼎力相助,嘉兴藏书家在保护文澜阁库书这一国宝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功绩永为后世永念。

### 四、结语

以上可观,嘉兴学者无论是在参编人数上还是

在之后的校勘、补书、护书的功绩中,都与《四库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殚精竭虑,搜存珍本,代代相传;广征博引,参互校勘,完善藏书,惠及后学;效法古贤,治学立说,继往开来,光大藏书,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编书这一天起至民国《四库全书》文本的保存,嘉兴人都相随始终,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面旗帜。嘉兴人的文本保护意识及深厚的人文传统也在《四库全书》的辉映中得到不断地凸显和升华。嘉兴学者因功成《四库全书》而彪炳史册,光耀千秋;《四库全书》因嘉兴学者的融入而更臻完善,更富地域人文精神。

## [参考文献]

- [1]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M]. 上海: 中华书局, 2003: 1965.
- [2] 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3] 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 嘉兴市志[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7: 2168—2190.
-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5] 吴慰祖. 四库采进书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60: 234.
- [6] 陈心蓉. 嘉兴藏书史[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256.
- [7] 任松如. 四库全书问答[M]. 四川: 巴蜀书社, 1988: 16.
- [8] 王国平. 西湖文献集成·文澜阁志卷(上)[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4: 9.

(上接第 100 页)

跃的要素,语法总是语言中最稳定的要素,它的稳定性不仅在于它的高度抽象,还在于它总是与这个民族的思维、观念、文化上的规则联系在一起。而词汇总是浮在语言的最上层,指称各种事物、行为或性质、状态。当某些事物出现或发生变化时,相关词语应运而生或发生相应变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日语借词虽说是外来词,但由于大部分都是用汉字表示的,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出口转内销”,从古汉语中借出去再传回来,因此没有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的外来词那么容易辨识。总之,我们要正视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在与外民族语言文化接触的同时,要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合理吸收,善于创新,而不要一味跟风,不知其意却滥用外来词,造成语言使用混乱。

## [参考文献]

- [1] 陈原. 语言与社会生活: 社会语言学[M]. 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1: 339.
- [2] 陈国强, 石奕龙. 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413.
- [3] 沈国威.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J]. 日语学习与研究, 1988(5): 14—19.
- [4] 王晓.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分析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9(4): 10—18.
- [5] 王保田, 梁作丽. 新时期汉语新词语剖析[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7): 65—68.
- [6] 周刚, 吴悦. 二十年来新流行的日源外来词[J]. 汉语学习, 2003(5): 72—78.
- [7] 邢福义. 汉语法特点面面观[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 1999: 146.
- [8] 陈保亚. 语言文化论[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3: 53.